

□郑学富

繁华热闹的汴京街市，鳞次栉比的酒肆商铺，远来的骆驼队、驴车、牛车、汴河上千帆竞发的船只……上千个动态人物栩栩如生，华灯闪耀每一处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，仿佛穿越千年来到汴京盛景之中。人们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可以看到北宋时期形形色色的交通运输工具。

驮队与骑行

打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首端，是郊外部分。小溪旁的乡间大路上走来的是一支驮队，五头驴负重累累正向汴京城走来，前面一人牵引走向拐弯处的小桥，后面一人扬鞭驱赶。在整幅画中驴是出场次数最多的牲畜，驮物的驴、人骑的驴、拉车的驴、休息的驴……据统计，全画大约有50头驴，可见驴是北宋时期最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。

图中所画骑驴者有各色人等。在城郊接合部的小道上，有夫妻俩出行的，雇了两头驴，还有两个脚夫挑着物品跟随。在汴河的虹桥上也有骑驴者。因为驴吃苦耐劳，且饲养成本低，朝廷对骑驴也没有任何限制，所以驴作为交通工具，深受中下层人欢迎，在宋代无论是长途跋涉，还是走亲访友，骑驴是最为常见的。一些士人和隐士出门骑驴已成为一种时尚。陆游的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诗云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

在图中的城门外有几头骆驼背负物资正在通过，领头的骆驼半个身子已探出城门外。当时的汴京是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，前来经商者不乏境外客商。汴京当时也饲养了大量骆驼，有资料说在千头以上。骆驼已是宋代普遍使用的畜力交通工具。

图中没有用来驮货或拉车的马匹，因为在北宋，马只能用来骑行。当时养马的成本是很高的，马价格高，饲料精细，且须有专人饲养训练，所以一般人养不起马。朝廷还对各个阶层的用马数量和马的装饰材质、颜色有具体规定，只有皇室或达官贵人才有资格在马上装饰金银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画的马约有20匹，骑行者看上去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头戴纶巾，身着长衫，有随从跟班。最气派的骑马者是画的最左端“赵太丞家”门前的那位，他头戴席帽，器宇轩昂，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员。八九个随从前呼后拥，有手拿竹条开路的，有背行李的，有扛遮阳伞的，还有执辔牵马的。

车子与轿子

《清明上河图》街市部分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，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，有茶坊、酒肆、脚店、肉铺、庙宇、公廨等等。街市行人，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。交通运输工具有轿子、骆驼、牛车、人力车，样样俱全，把繁华景象展现于人们眼前。

牛车大致分两种：一是城门外平桥东头十字路口有两辆由三头牛拉着正在行走的车，车厢两侧和两头都是用木板挡着，车篷是用苇席做成；二是再往东边的十字路口，有两辆由两头牛拉着的车，一走一停。此车用棕做车盖，状如歇山式屋顶，车厢前后有栏杆门，垂挂着帘幕，这是富贵人家女眷乘坐的车子。看来，北宋的牛车多是用来自载人的，如电视剧《清平乐》中，宋仁宗视察民情、范仲淹去书院任职的时候都是用的牛车。

图中的驴车有三种类型：在图左端十字路口南面的“久住王员外家”门口有一辆一人驾辕，二头驴拽拉的“平头车”，车上载的是两只酒筒桶；在其北面路口有两辆由一人驾辕、四头驴拽拉的“太平车”，可装数十石重的物件。其中一辆已经卸完货物，一人坐于车上。在旁边的刘家店铺前有一辆人力独轮车和挑担者；在城门外有一辆独轮车，一人在后面推，一人在车前双手把辘掌握握方向，一驴在前面拽拉。此车为“串车”。从图中看驴车的功能主要是载货。

图中的轿子出现得很多。北宋时期，轿子不仅是一种代步工具，更是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。在北宋中期之前，对官员乘轿也是有严格限制的，宋代的轿子品种繁多，以乘坐者的身

份区分，有銮舆和檐子，銮舆是皇帝专用的轿子，檐子则供达官贵人及其家属所用，俗称官轿；以轿子材质分，有竹舆、藤轿、板舆、梯轿；从用途上分，有女性乘坐的女轿、结婚用的花轿、办丧事用的丧轿；从抬轿的人数分，有二人小轿、四人小轿、八抬大轿等，还有不上帷子的凉轿和上帷子的暖轿。宋太宗曾明确规定，如果没有官级在身，是不能乘坐暖轿的。

由于各种交通车辆的普及，修车行业应运而生。图中的临河路边就有一家修车行，锤子、刨子、凿子和锯各种工具应有尽有，一老一少两个修车匠正在忙着。汴京车轿出租行业也大量出现，一般人家出门用车轿都是租赁的。在修车行对过拐弯的街道上，一位货主租用毛驴，驮工正在把地上的货物往驮上，还有一位女士准备租用一乘轿子代步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：“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”

客船与货船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长达5米多的风俗画卷中，汴河风光占了画面五分之二篇幅。汴河是黄河水系的组成部分，隋代大运河中的通济渠即由汴河故道改造而成。大运河开通之后，汴河成为联系中原和江南的大动脉，尤其在北宋，汴河“半天下之财赋，并山泽之百货，悉由此路而进”，全国各地的财赋、百货源源不断地运抵汴京，保障了汴京的物资供应。所以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交通枢纽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将汴河舟楫连楫的繁忙运输场面和两岸店铺林立、商贾云集的繁华热闹景象描绘得生动形象，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。

图中虹桥左边码头停靠了五艘大船，有客船也有货船。客船船舱外部雕梁画栋，船上桅杆都被放倒。有一人挑行李正在登船，后面一主一仆随行。在虹桥下的码头上还有不少人向客船上招呼，他们是迎接自己家人或亲朋好友的，有的还上了虹桥，借虹桥的高度招呼，以便早点见到亲人，旁边一只小一点的客船上也有人挥手呼喊，那是在招揽生意，呼唤需要到分河航道码头的客人，可以想见当时汴河水上交通多么发达，水旱各路构成了客货运交通网络。

主航道上正在行驶的是两条货船，看来船载很重，吃水很深，有一条大船没有拉纤，船头船尾各有六个人在用力摇橹（虹桥东的一艘货船则是八个人）。另一艘逆流而上的货船，岸上的纤夫们正在弓腰拉纤。在虹桥右侧，有艘货船正要穿过桥洞，船夫有的站在船篷顶上，落下风帆；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；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，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。这场面既紧张又有条不紊，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，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。

从图上看，客船船体狭长，船尾向后伸展，尾部有假尾（虚梢），用以增加甲板和舱室的使用面积。舱室装饰得很豪华，宽敞、舒适，两侧都有比较大的窗户，供通风与采光，船舱的甲板外挑，造有楼台亭阁，客人们可在这里把酒吟诗、挥毫泼墨、品赏两岸风光；货船则较大，拱形顶棚遮风挡雨，装卸货物通过开向两舷的货舱口。船尾有平衡舵，既可减轻舵工的劳动强度，又能改善船体的操纵灵活性。这也反映了北宋造船业的发达。

汴河中有很多漕船，图中画了两处码头卸船的情景，工人们肩扛粮袋正向岸上走来，有的已将粮袋码在一起，主人坐在粮袋上指挥。汴河漕运主要任务是将江南粮米运到汴京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“中曰汴河，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，东去至泗州入淮，运东南之粮，凡东南方物，自此入京城，公私仰给焉。”据考证，这些大船能载重1.3万石，被称为“万石船”。汴河的航运不仅保证了京师百万以上军民的衣食所需，而且也带来了汴京的繁荣，使得汴京成为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的国际大都会。北宋诗人黄庶在《汴河》诗中写道：“万艘北来食京师，汴水遂作东南吭。甲兵百万以为命，千里天下之膂肠。人心爱惜此流水，不啻布帛与稻粱。”



□李学朴

【短史记】

师爷：流传天下无官衙

师爷，是旧时对幕友的尊称。幕友，又称幕宾、幕客、西宾、宾师等，指受各级官吏聘请帮助处理政务的人。清代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“仆人称官员为老爷，称幕友为师爷。”师爷一词的称呼始于清代，从事此业者多为浙江绍兴人。

师爷，按其源流，源出周王之官——“幕人”。《周礼·天官冢宰第一》记载：“幕人掌帷、幕、幄、帘、绶之事。凡朝觐、会同、军旅、田役、祭祀，共其帷、幕、帘、绶。”《周礼注疏》中则说：“王出官，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，掌次则张之。”据此看来，“幕人”的职责就是掌管帷幕等物，并在周王朝觐、会同、军旅、田役、祭祀时张幕、设案。

汉代，幕僚制度已基本成型，公卿、郡守都有权聘用僚属。东汉光武中兴之后，辟召之风尤其兴盛。光武帝刘秀曾征召过故人严子陵，但严子陵却宁愿在富春江钓鱼。东汉末年，各派豪族军阀拥兵割据，为确保各自发展，争将天下名士罗致幕下，以壮势力，这导致了幕僚制度进一步发展。

东晋时期，权臣桓温图谋篡夺天下，参军郗超为他谋划。谢安与王坦之曾经去拜访桓温，谈论国家大事，桓温就让郗超藏在幕帐之后偷听。没想到一阵风吹来，吹开了帘帐，郗超露了出来，谢安笑道：“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。”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“幕宾”一说。南北朝时期，名士庾亮之受聘到王俭的幕府去做长史，有朋友表示祝贺，说有这样的名士入幕，好比芙蓉依傍着莲花池的绿水。后人因为这个典故，往往将幕府雅称为“莲幕”。

古时师爷的职责，主要在于协助判案、管理钱粮、起草文书、整理档案等。与此相呼应，师爷也分为五大类：刑名、钱谷、挂号、征比、书记。在州县以刑名、钱谷二者责任最为重大，地位也较其他师爷为尊。

明清地方官府是行政和司法合一，地方官既是行政长官，又是司法长官。他们所管的事主要有两件：一是审理刑事、民事案件，二是征收钱粮，上交藩库。清代有人说，州县衙门里总是响着“三声”——板子声、算盘声、戥子声。说的就是地方官府所处理的事主要是办案和征收钱粮这两类，这两类事中，又以办案最为重要。清代有一种说法，叫“亲民首在理讼”，即是说办案是亲民之官（州县官）的首要大事。案子办得好坏，是朝廷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。所以，地方官都很重视案件的审理。

但是，清代地方官多是科举出身的“读书不读律”的士人，必须仰仗精通理讼的师爷来协助办理。清人陆向荣《瘦石山房笔记》云：“近日官途多依靠幕友，而于读律毫不讲解。”（引自《牧令书辑要·刑名》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由于师爷在案子审判中掌

握重权，所以很多人的祸福生死就操在他们手里。清代协办大学士、太子少保纪昀在《阅微草堂笔记·槐西杂志三》中记述一位时人所说的话：“幕府宾佐，非官而操官之权，笔墨之间，动关生死，为善易，为恶亦易。”清代绍兴山阴人金植因为亲戚和同乡中有很多当刑名师爷，所以对此感触尤深，他说：“一切入幕主文之法家”，执笔时一定要“切切警醒”“倘稍有冤抑，一著点墨，则人命立休于笔下”（《不下带编》卷七）。另一个绍兴人俞蛟也说：刑名师爷“按律引例，以判罪人，生死所争，在毫厘间。”（《梦厂杂著·纪西粤幕》）

师爷一行多与文书案牘打交道，因此只有读书人才能胜任，读书做官是学子毕业所孜孜以求的目标。许多人为此皓首穷经、老死牖下。但是，对于大多数师爷来说，这种梦想不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科考失意后，及时退出改习此业的，有的从事这一行长达几十年，不再以科举为念。

入幕得势的师爷，往往成为盈利之徒，甚至声色犬马无所不为。万维翰就感叹道：“幕中之流品，最为错杂，有宦辙覆车，借人酒杯，自浇块垒；有贵胃飘零，摒挡纨绔，入幕效顰；又有以铁砚难磨，青毡冷淡，变业谋生……”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既然师爷群体的成分这么复杂，品行不端者就在所难免，上下勾结、朋比为奸的大有人在，欺上瞒下、涂改公文、把持官府、胡解案例者也不乏其人。

清代徐珂所辑的《清稗类钞》中，便对师爷的此种伎俩有着生动的描述。在师爷中，最能作弊的是刑名师爷，因为清代颁布的法令多不甚确切，对一个具体的案件，多半是根据以往的下例来判定，这样就给了师爷上下其手的机会，许多冤狱，都由他们操持。如同治年间轰动京城的杨乃武冤狱，便有一绍兴师爷不光彩的表演，他私通案犯，逼取伪供，致成大狱。丁宝桢为福建巡抚时，某县有开棺剥取尸身衣物一案，该县刑名师爷为替县令掩饰，在文书上故意用模糊含混字样，以图蒙混过关，终被查出。这样的事例，在晚清文献上并不少见。无怪乎当时的人对师爷以“搞来搞去，终是小人”嗤之以鼻了。

民国初年，有的师爷摇身一变成民国幕僚，但师爷体制余习未尽，职业思想还没有变过来。民国幕僚人数之多不亚于清代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军政长官普遍重视幕僚，这些幕僚被称为顾问、参议、参谋、秘书、副官等，实际上就是清代师爷称谓的花样翻新。

历史上文人历来有重视文史的传统，许多师爷因长期游幕，笔记作品多载当地风土人情、社会百态，如鄂斯道《游梁草》《抚豫宣化录记载河南之事》《全庶熙日记》载滇黔两省事，宣鼎《秋雨夜灯录》详述清末社会大量丑恶现象。另一个师爷吴焯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写成《客窗闲话》及《续客窗闲话》，书中描述的活脱是一幅社会百态图。这些著作不仅文字可读，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那些运筹于历史帷幄之中，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，盘桓于州县衙门之内的师爷们，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，如今只留下一段传奇的历史，一桩桩辛酸的往事，一个个缥缈的背影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